

记忆的歧义

孙传钊

尽管社会记忆研究没有学科限制,一般来说,知识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较多关注社会记忆论题,政治学或文化批评领域较少有人注意这个论题。近来出版的两本看似没有什么联系的书,却都涉及了同一个话题。

除了记忆,还需要思考

一本是汉娜·阿伦特的女弟子,也是最权威的阿伦特传记的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的《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按照布鲁尔的阐释,阿伦特晚年之所以强调通过思考来辨别新事物的本质,就是因为光凭机械的回忆、寻找历史的类比、铭记历史教训,以免重蹈覆辙,是有其局限的。只有不断思考才能避免思想僵化,才能辨别善恶,正确认识新的现实。

当然,阿伦特看到记忆和简单历史类比的局限,并不是放弃她坚持的事实真理与理性真理相比更为重要的原则,而是因为阿伦特擅长分析具体的环境和历史,发掘人们“经历中没有先例的新事物”。“1971年,在评论五角大楼文件的文章《政治谎言》中,她首先讨论了政治史中一贯存在谎言的现象,之后,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在纳粹政权谎言无所不在的新特征。”最后,把目光转向当时美国政府的官僚们,揭露他们制造谎言的新手法,企图用一种貌似科学论断、看似无害的谎言来否认不符合他们理论的事实。(参见《阿伦特为什么重要》,第6~7页)我想,阿伦特之所以要人们突破、否定简单、随意的历史类比方法,是出于她的历史偶然性的信仰,出于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即个别历史事件、历史状态中总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征——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我们今天分析当下面临的各种社会难题时,机械、简单的历史类比也显示出方法上的局限。比如,最近几

年,追忆 60 多年前的学者、大师品格高尚、学术深邃的一类文章越来越多,几乎要成了今天研究 20 世纪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一个热点了。研究者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这种追忆表达来抨击、纠正眼前学术制度和学人学风腐败不堪的现状。但是,这些旧时代、旧体制的学界前辈的榜样,在今天学术界根本发挥不了他们的道德感召力,学术腐败日趋严重。人们在一个不同于往昔的新的社会环境之中,好像人人都已经处在一个难以完全摆脱的、无边无际的、肮脏的泥潭之中。所以,这类追忆文化人、学术人的历史研究,真要借题发挥、以史为鉴,逼近这 30 年来的学风腐败新特征或根源的话,还必须要抓住当今与前 30 年或者 60 年前学术界、教育界及其制度不同的、新的本质特征。

另一方面,也因为阿伦特重视人的记忆,认为记忆与思考有着紧密联系。

如果我们拒绝思考、记忆,虽然也能像极其普通的人那样生活,但那却是危险的事,对我们自己来说,实现人类最高级活动的能力——言说能力,将会受到很大损伤,自己使得自己的说话失去意义。不仅如此,对其他的人来说,本来应该具备高度的知性,现在也不得不作为一个丧失思考能力的人来生活。所以,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他人,这都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而且,假如我们拒绝记忆的话,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会感到困难。比如,如果忘记了痛苦的经历,我们的勇气会成为极其盲目的东西。(引自日文版《责任と判断》,第 114 页)

阿伦特重视人的记忆,是“因为讨论记忆问题,也必定要进一步涉及一些恶的特征问题。——对于人来说,思考往事,是一种不断的深入,是寻找自己的根,让自己安定下来。这样做,即使发生受到时代精神、历史等诱惑的事件,也不会随波逐流。最大的邪恶,是无根的。没有根,也就没有限制,没有思考,所以它会蔓延到全世界”(同上书,第 115 页)。

阿伦特也曾指出,必须警惕有人通过绝对、彻底地强调记忆中事件的唯一性来达到获得道德上神圣性、美化自我的目的。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理论上的贡献之一,就是揭示了:即使真实记忆,也可能由于记忆者有目的的选择或强调真实的某一侧面而产生负面影响。该书涉及了这样一个引起西方学术界激烈争论、特别引起犹太人学者群体民族义愤的观点:以色列国家企图利用历史记忆在国际舞台上显示、证明构成其国家的犹太民族作为遭遇唯一大屠杀的受害者在道德上(政治上)必然的神圣性。除了阿伦特在该书中强调犹太人



社区领袖配合纳粹种族灭绝行为之外，她对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历史记忆获得道德上优势的批判，也是遭受群起而攻之的主要原因。

恶的记忆·善的诱惑

另一本书是《跨文化的对话》第2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这一辑中，由三篇与兹维坦·托多罗夫2007年深秋访问中国时在北大做《恶的记忆·善的向往》（也许译成《恶的记忆·善的诱惑》更妥帖）演讲有关的文章，组成一个“托多罗夫研究”专题。这一演讲中关于“记忆”的论述，是他同名著作《恶的记忆·善的诱惑》（*Mémoire du Mal, Tentation du Bien*, 2000）相关部分的浓缩。在该书中，托多罗夫对历史记忆的伦理问题有深入分析和独特见解。

他对常被人们过度频繁援引的乔治·桑塔亚那的那句箴言——“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可能产生的歧义与后果，抱有疑虑和警惕。在他看来，非民主制度社会里，因为权力通过消灭历史痕迹（如禁止和销毁书籍、拆除于己不利的纪念碑等等手段）、暴力惩罚的恐怖（对传播禁止的真实信息的人给以严厉法律惩罚）、特殊的言语修辞（如把屠杀、灭绝犹太人叫做“最终解决”）、制造极端的谎言等手段，控制人们的记忆和历史真相的叙述。还有，在这种社会里，公民也无权把握公共领域历史事迹显扬的各种手段（比如，民间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纪念碑的创建，在公共场合进行书面或口头历史追忆，等等）。因此，记忆者或历史学学者或被收买，或出于恐惧，就会放弃本来应该守卫真实的职责，或者隐瞒“事实”，或者制造虚假“事实”。所以，这种体制下追求真理的人们往往因为特别珍惜、关注被埋没了的记忆——历史证言，而过分强调记忆的重要性。今天的民主体制，虽然不能控制民众记忆和历史叙述，但是，即使美国那样的社会因为产业化了的大众文化泛滥，不仅真实信息被消费和物质享受所掩盖，而且也慢慢地使得民众远离真实的历史，远离人文主义的精品，忘却伟大的传统。从这一点上来看，记忆、继承优秀历史传统，对民主社会的公民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但是，托多罗夫认为，即使如此也不能“对记忆无条件的礼赞”。因为记忆与历史学研究一样，本身有三个阶段：（1）重新获得真实的事实，（2）意义的阐释，（3）利用前两个阶段的认知和阐释服务于现实公共生活。与前两个阶段分别相对应的是：记忆者或历史学家追求的分别是符合的真实和解释

的真实。它们分别相当于阿伦特关于真理论述中的所谓“符合事实的真理与符合理性的真理”。就因为记忆“与自然范畴一样,历史本身并无意义,并不独自传授任何价值;意义与价值来自拷问和评判它们的人,所以同一事实可以接受相反的阐释,并可能从各自立场出发,分别为相互对立的政策提供论证服务”。于是,倘若记忆被“很好地使用于某一正确的事业,也并非重现历史”。

今天我们看待本国的历史也是如此,同样的历史真实,也可以为评判者的价值观所左右。不少人今天提倡旧时代的“北大精神”传统,然而,即使我们真实地把老北大的方方面面真实、详尽地回忆出来,人们因为立场、价值观的不同,不仅记忆选择的角度、侧重可以不同,结论可以众说纷纭,会使人眼花缭乱,也并非通常人们盛誉的所谓的“兼容并包”那样简单。记忆的选择、阐释和利用,与历史学研究一样,价值标准不可能与记忆或研究主体相分离,处于一种纯粹客观的状态。承认同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所谓历史教训、以历史为鉴可能因人的价值观不同而南辕北辙。比如,希特勒在《餐桌谈话》中,谈起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在一大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却强调那样的惨事,仅仅事隔20年,“今天还有谁记起那场屠杀呢?”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时期,也对莫洛托夫等人说:“一二十年以后谁还会记起这些没有价值的家伙,就像伊凡大帝抹去的那些贵族的的名字那样,现在还有谁想起?”他们提起过去,想到的是希望将来人们忘记他们今天的恶行。

何况,即使历史学学术研究,也就如马克·布洛赫所说,重现历史还得为历史学家的良心所支配。历史事件真相之所以不会自动产生,那是因为记忆内容的本身,还涉及需要由一个记忆者按照主观价值观,对往事、历史事件(事实)甄别、选择的问题。“价值观正确与否是能否作出忠实于历史真实记忆选择的一个根本要因。”(《恶的记忆·善的诱惑》,日文版,第248页)托多罗夫认为,20世纪60年代法国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之所以否定苏联存在古拉格,并非记忆力有什么缺陷,而是信仰的意识形态禁止他们作出这种记忆选择。而在当纳粹的集中营毒气室已经被摧毁的20世纪60年代,这种对正存在着的古拉格的否认,比对曾存在过毒气室的否认更具有现实的危害性。(同上书,248页)因此,不同的人获得记忆的一致性是很难的,它要超越无穷的差异,并被差异所建构。为了获得对记忆的解释的支配地位的斗争,源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利益的相互影



响和冲突。获得很多人的记忆,往往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结构。福柯曾指出,记忆在竞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也就控制了他们的原动力。为了挑战民族国家对历史编纂的学科权力,福柯采用了“反记忆”的概念,指那些不同于统治话语和经常挑战统治话语的记忆。而群体可以使用过去的形象和与历史作斗争作为手段确立其权力,但同时也可能失去其权力。因为记忆无法将往事、历史完整地原样复原,所以,哈布瓦赫(Halbwachs)要强调集体记忆的当下性,认为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

因为这种“当下性”,在某一历史时期,长期在强势暴力威胁社会环境下的人们,会丧失按照自我价值观选择记忆的能力。海伦娜对南非种族主义的研究发现:南非国家统治的暴力和残忍的国家政策长期实施的结果,危及国民的身体、心智,以及由此带来的南非人普遍对历史真实的追忆取保密、谎言和沉默态度,危及个人思考历史的基本能力,对集体的公共的历史构成了极大的影响。这种伤害的后果是,个体的历史记忆与官方历史结合起来,集体记忆建立在沉默和谎言的基础上,丧失了其真实性。但海伦娜同时也指出,这种沉默、谎言与暴力的共谋不会完全取得成功,因为还有一些建立在个人良知上的记忆,会与集体和官方记忆“交战”。个人的行动可能是不合逻辑、琐碎和软弱的。但是,另一方面,个人单独的讲述和写作不管怎么细小,尽管“个人的细节(Human detail)”通常看起来是不重要的,但是它们在与他者相遇,而且也与这个世界互动,个人历史意向的表述会修改、转化甚至重建公共记忆,尽管记忆也受到了伤害。(转引自郑广怀:《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

忘却有时是必要的

社会学家鲍曼(Bauman)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曾指出,历史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忘记的过程,而且记忆正因它的选择性而闻名。托多罗夫在论述中也批评将记忆正面功能绝对化。他认为,由于记忆必然是人为筛选,忘却并非是与记忆完全对立的東西。“忘却”(消去)的反义词是“保存”,而不是“记忆”。记忆是保存与忘却相互作用的结果。要完全把历史、过去复原是不可能

的,如果过去、历史能够完全保存的话,那也是可怕的。如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的主人翁,就因“庞杂而又无所不容的记忆”带来了不可回避也无法挽回的悲剧性命运。记忆者的“人为选择的特征保留下来,其他的都慢慢地退行,从而最后忘却了。如果不加选择地保存,也等于没有记忆”。我们记得行恶者的恶行是因为他们这些行径留在我们的一些记忆的要素上,而不是他们的全部行为。我们对记忆有所选择;相反,权力行恶者也同样如此,只是不正当地控制和剥夺了应该由人们自由选择记忆要素的权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记忆与忘却不仅不对立,记忆正包含着忘却,部分忘却是不可缺少的(《恶的记忆·善的诱惑》日文版,第170~180页)。其实,早先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也曾把记忆分为对立的“非意愿记忆”与“意愿记忆”。意愿中掺杂主观价值判断。本雅明也看到了这一点,曾说“遗忘是个大容器”,我们要警惕的“记忆”也同样可能是个杂乱无章的大容器。

记忆是保存与忘却相互作用的结果,明显的事如最近10多年,俄罗斯当局把国家共识(民族共识和民族认同)建立在这种叙述上的尝试是完全成功的。实际上,塑造战争神话就是要压制人们对古拉格的记忆,重新命名和压制人们对非理性的不公正的苏维埃体制下的苦难受害者的记忆。战争神话的“大熔炉”把屠杀者和受害者等同起来,把整个社会团结起来对付德国这个共同的敌人。这种英雄叙事把从前的罪恶都掩埋下来,提供了“苏维埃人民新国家”的真实基础。战争神话的最重要功能(它的成功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让俄罗斯人相信古拉格不过是英雄的苏维埃历史上的小插曲而已。(迪纳·卡帕瓦:《被遗忘的历史:后苏联社会的哥特式的道德》,吴万伟译,引自天益网)这种民族认同的人造记忆或遗忘功能一再被人沿用。另一方面,记忆会带来仇恨、报复的反应,而这种报复却是人类相互残杀的重要诱因。比如,法国民族主义文人巴雷斯、贝矶等人以1871年战败的历史记忆煽动民众不要忘却往昔仇敌,催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希特勒向国民宣传不忘凡尔赛条约耻辱,使得其战争为国民作为正当的决策而拥护。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半岛上的屠杀也是唤醒记忆后实施的,其实是唤起仇恨和复仇的结果。这种唤起复仇的记忆,现实也是处于完全被过去的支配下。因此,托多罗夫指出,在有些场合,与“恶的记忆”相比,忘却也是人类需要的一种记忆的选择。



记忆的神圣化与庸俗化

托多罗夫认为,因为价值观与选择主体难以分离,所以“恶的记忆”是必然产生于神圣化与庸俗化这两个暗礁之间:或者神圣化,即把记忆彻底地孤立起来,把某一历史事件绝对成无可比拟的圣物、圣人;或者就是随意庸俗化,在记忆的过程中肆意把现在等同于过去,随意地进行历史类比。由于“善的诱惑”,人们为了获得道德上的收益,喜欢在记忆中突出建立功勋的、施善的英雄或无辜、善良的受害者。托多罗夫举例说,在原子弹投下广岛 50 周年的时候,美国参加二次大战的老战士们对强调国内开展的核爆炸惨状的纪念活动提出抗议,因为这种活动使他们失去英雄的光环,成了要对屠杀负起责任的人。相反,广岛和整个日本举行同样的 50 周年纪念活动,却完全把自己打扮成单纯受害者的角色。20 世纪 90 年代后构成托多罗夫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的反善恶二元对立论,也贯穿在他对记忆的分析中。他推崇二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勇敢女战士、学者热尔梅娜·蒂利咏的伦理观克服了记忆的神圣化与庸俗化:

一方面,她避免把过去神圣化,避免把她熟悉的事件辉煌地孤立起来,视其他地方发生或以后发生的其他事件都不能与其相比拟,把任何将该事件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相关联的做法一概看做亵渎行为。呼唤过去是为了显示服务,并非是为了过去而培植过去。另一方面,她也避免步入庸俗化的泥潭:事件并不能重复,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过去的状态简单地搬到现在,而放弃应该永远引领我们前进的大原则,如正义和同情等原则。(《跨文化的对话》第 23 辑,第 173 页)

蒂利咏把追求阿尔及利亚独立解放战士与当年抵抗运动老战士一样看做是为正义而战,拒绝把他们叫做“恐怖分子”。而那些当年抵抗运动英雄老战士因为铭记被纳粹占领的耻辱,都又在印度支那战场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为国家冲锋献身。敌和友、善与恶难以简单分辨。因为法国军队捍卫国家权利名义下的杀戮和殖民地解放战士以自由、独立名义杀人,似乎双方都很理直气壮。但是,蒂利咏不是道德虚无主义或价值相对主义的信仰者,她认为即使这样,并不能改变这样事实:“双方伤亡的是活生生的个人”(同上书,172 页)。

受害者同时是加害者

上述蒂利咏的观点和实践,曾引起不少二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老战士的

无比愤怒。同样原因,《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因为批评以色列当局把记忆的神圣化,提起受害者的伦理问题,犹太人社区领袖配合纳粹屠杀的往事,成为阿伦特一生中最为人们争议的著作。为坚持这些观点,她差点与汉斯·约纳斯绝交,还失去了自青年时代以来就结成深厚友情的许多老朋友。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的受害者对极权主义体制顺从甚至主动合作的伦理问题,虽然20世纪60年代引来不少争议和指责,但是这样的事例之后不断在大量回忆录等见证文本中出现,至少证实了阿伦特问题意识并非捕风捉影。

极权主义体制的受害者同时是加害者的问题,恰恰是人们往往要回避的又难以回避的问题。欧美这类“见证文学”及其研究最大的价值不是在于文学性,而是其道德意义:人类能辨认苦难的存在与根源,共同担负起伦理责任,分担他者苦难,具有维系社会正义和团结的作用。这类人类灾难见证(如对纳粹的大屠杀思考)能对普通公民道德判断和政治行动产生积极作用。

然而,一个社会完全失去民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个人伦理自律——民主社会存在第一条件的同时,建立在个人自律基础上的公共领域内的自律和约束也荡然无存了,当政者可以随意解释或改变任何法规,任何法定规则,都有无数例外。于是造成了人格特征都是“两重化”:认知与行为实践分离。于是,受害者往往又是这个体制的维护者,甚至在另一些公共生活领域充当加害者。这种不正派的社会还因此能够恶性循环长久延续。坚持道德自律的人、拒绝“两重化”的公民就会被作为不顺应体制的“敌人”得到惩罚,几近绝迹。社会政治生活中不仅“告密”、“检举”盛行,由于告密能获得升迁和利益,人们都以他人的苦难作为自己的愉悦。因为人对死亡的恐怖胜于对自由的渴望,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人们都失去自律的伦理规则。在《独裁体制下的个人责任》一文中,阿伦特说,这种丧失道德自律的人们,不仅是感觉到暴力的威胁才屈服、追随纳粹运动,不少人实际上是怕赶不上新时代起点“历史的步伐”而主动地参与。所以,诱惑与威胁一样,同样能使人丧失道德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在法庭上,因为自己受到威胁或利诱才行恶只能作为威胁、利诱者犯罪的证言,但是这不能成为自己屈服道德上正当性的理由。那些拒绝在公共领域与纳粹配合的人们,是仅有的还能用自己的头脑依据原先的善恶标准作出道德判断的人们,他们的良心不会自动地随波逐流地转换。这些坚持习惯的道德准则的人们,也就是质问



自己,不愿意自己与自己(良心)过不去、下决断的人们(日文版《责任と判断》,第55页)。托多罗夫在《面临极端》、《失去家园的人》等著作中也指出,在这种社会体制下,并非人人都犯有同样程度的恶行,甚至面临极端困境时,能够坚持内在良知、表现出令人感到意外英雄壮举的却可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小人物。因此,建立在个人良知上的真实记忆,对于国家、民族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另外,托多罗夫在书中提出关于历史追忆中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我想这些对我国公共知识分子进行历史追忆时也是值得注意的,这里略陈三点:其一,在记忆、寻求20世纪发生极端邪恶的悲惨事件真相时,与考察人们逆来顺受的行为相比,更要关注、追忆那些与恶行积极斗争抵抗者、人类生存救济者的高尚、英雄行为。这些人物和行为具有道德号召力。其二,今天我们要警惕后学(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的盛行,道德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对记忆主体的影响。托多罗夫赞赏雷蒙·阿隆在价值观上调和了列奥·斯特劳斯绝对论与马克斯·韦伯相对论之间的对立,认为即使因为文化的多元,即使不存在绝对真理,但是人类也有超越历史的、普遍的共同价值标准。其三,记忆,特别是记忆民族苦难史,有着个人认同自己族群、民族归属——身份同一性的功能,这本也无可非议。但是,问题是其激发的民族主义往往出自神圣化的记忆,对同一归属的人的苦难、自身的不幸特别关注,无视其他族群、民族的苦难史。但是,如果能把这种关注迁移到其他族群、民族,那么,问题是功能认同的迁移,就更能体现记忆本身正义的价值。比如,日本民族纪念广岛原子弹悲剧,也同样重视南京大屠杀;美国犹太人在不忘纳粹屠杀的同时,也关注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才更具有和平意义的象征。这也是因为人类也有超越历史的、普遍的共同价值标准。

总之,阿伦特、托多罗夫在思考历史记忆时,都不忘继承从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到康德伦理思想之传统——试图解决个体自由与义务化的主体规约矛盾,都认识到即使在民主社会里,道德价值观依然是与我们当下的记忆和历史研究——历史教训、以史为鉴不能分割的一环。